

領域感、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研究

游士嫻* Yu, Shih-Hsien

目 次

- 壹、前言
- 貳、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 一、環境、日常活動與犯罪被害的關聯
 - 二、環境犯罪預防
 - 三、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四、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
 - 五、小結
-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 肆、研究結果
- 伍、結論與建議
 - 一、研究主要發現
 - 二、政策意涵
- 參考文獻

*游士嫻，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所博士生
Email：office.susain@gmail.com

領域感、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研究

摘要

由於 2020-2023 年侵襲全球的 Covid-19，使居家防疫改變了人們的日常活動方式與地點，住家半開放空間成了必要的主領域，其間發生的犯罪被害事件及其恐懼感不容忽視。本研究依據環境犯罪學中日常活動理論及防衛空間理論探討疫情期間住家半開放空間被竊恐懼感，及與鄰里、自家風險與保護因子之關聯性，以提供居住安全及犯罪預防學術及實務參考。遂於 2020 年 5-7 月間針對臺北市中山區 234 位居民進行住家及其環境訪問後，以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發現領域感解釋較多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而被竊經驗除可直接顯著增加被竊恐懼感，也透過集體效能中介影響領域感，然總效果仍增強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另集體效能亦直接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但透過領域感減緩上述恐懼感。本研究填補了住家半開放空間居住安全(被竊恐懼感)之研究缺口，並提出政策建議盼能強化居住安全及犯罪防治之果效。

關鍵詞：領域感、集體效能、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被害恐懼感

Territoriality, Efficacy, Fear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bstract

Due to the Covid-19 invaded the world from 2020 to 2023, home epidemic prevention has changed the way and location of people's daily activities. The semi-open space surrounding the residence has become a necessary main area. During this period, crimes, victims and their fear cannot be ignored. According to Routine activity theory and Defense space theory,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during the epidemic and risk or protective factors, providing academic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residential security and crime prevention. Interviewed 234 residents in Zhong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May- July, 2020, and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Research find: First, territoriality explained most fear. Seco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directly and through collective effica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ear of burglarized. Third, collective efficacy also directly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fear, then indirectly alleviated the fear through territoriality. This research fill gaps on living security (fear of burglarized) in semi-open spaces of residence, propos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enhance residential and crime prevention effects.

Key words: territoriality, collective efficacy, burglarized in residence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ear of victimization

壹、前言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馬太福音 5：7）被害者在傳統犯罪學理論及刑事司法體系雖不被重視，但從德國學者 Hans von Henting(1948)提出被害者在犯罪過程中與加害者之關聯，引發被害者學理論之研究，及至聯合國自 1985 年通過「為犯罪和濫權下之受害者取得公理之宣言」後，始有犯罪被害保護救助服務及補償措施。而我國在 1998 年制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2017 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將犯罪被害人保護提升至人權保護之一環，2022 年完成「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法，將被害者權益帶進新里程，除了落實人身安全與隱私保護，且要加強被害預防。

今(2024)年 8 月 6 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國內新冠疫情下降，惟處流行期且重症及死亡病例數仍多，須留意重症發生風險，預計 8 月下旬可脫離流行期（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4）。回顧自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狀病毒在中國大陸出現，到 2020 年 2 月臺灣首例死亡個案發生，本土社區感染疑慮一度加深，2020 年 3 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宣布其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後，大部分國家開始實施抑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以遏止疾病擴散，包括：限制出國旅遊、封城、隔離、居家辦公及保持社交距離等，美國於 2020 年 3 至 6 月、英國政府於 3 至 5 月封城(lockdown)、我國於 2021 年 5-9 月實施居家上班(stay-at-home)、美國於 2020 年 3 月底甚有 90%居家工作(Washington Post-ABC,2020)，公司行號商家暫停營業改以線上交易，學校、社團活動等也暫停或採遠距教學，人們的工作、通勤、飲食、休閒等所有日常活動都在防疫居家工作大環境下轉型，這場危機可說在人類歷史中改變了百萬人的生活。而 2022 年 11 月中國烏魯木齊、上海、北京、南京、成都、廣州等大城市因抗議當局嚴苛的清零政策而舉白紙抗議，似乎訴說著人們所需要的活動空間在抑制病媒傳染要求下被限縮而必須妥協的負面情緒，而住家成了此背景下的主要活動空間後，以往被忽視的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樓梯間、騎樓、公共設施場地等）則成了人們面對此波壓力下聯繫人際網絡支援的場域，當中正開創著另類都市生命力，而其間可能發生的竊盜與被竊因素，以及如何預防，是本研究所關切的。

當全球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環境中，正面地從媒體報導及文獻（如：Campedelli,

Aziani, & Favarin, 2021; Halford et al., 2020; Fattah, 2020; Stickle & Felson, 2020; Payne & Morgan, 2020) 中略窺犯罪率的下降，但各國、各城、各案類呈現不同變化，各研究也都存有樣本不具代表性無法推論至全球的限制(Murdoch & Byczynski, 2021)，但 Stickle 和 Felson(2020)鼓勵研究者針對特定犯罪類型比較 Covid-19 前後不同犯罪發生地及土地使用分區，以及 Covid-19 疫情期間居家辦公之影響，好能藉此思考未來如何讓犯罪減少讓人民居住更有韌性。觀察本土臺灣 Covid-19 疫情未發生前(2019 年)臺北市住宅竊盜發生 438 件，以大安分局 63 件最多、其次為中山區 56 件(表 1)，而臺北市中山區是臺灣一個繁華地區，兼具富饒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存在犯罪引誘者(attractors)及促發者(generators)之犯罪標的及被害者。一般而言，中山區是以商業發展著稱，特別是以南京東路、中山北路等地段為主的商業區，擁有眾多的商場、餐廳、商店等。然而，中山區也有不少的住宅區，尤其是在偏遠一些的地方，有許多寧靜的住宅社區，相對大安區較能比對出居家防疫造成住宅區和商業區侵入竊盜的變化(圖 1)。經整理臺北市中山分局於 2021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 日居家防疫期間之「住宅防竊安全檢測報告表」發現住宅竊盜 9 件，其中 4 件發生於都市計畫住宅區、5 件發生於商業區，相較於疫情發生未全面居家辦公(2020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減少 3 件，係商業區減少 7 件，然住宅區住家被竊增加 4 件；若與疫情發生前(2019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相較乃減少 4 件，係商業區減少 3 件，住宅區減少 1 件。整體而言，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辦公期間侵入竊盜減少，但住宅區發生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提高，亦即居家辦公後住宅區住家被竊比率自 38.46%提高至 44.44%，增加 6 個百分點，而商業區住家被竊比率自 61.54%下降至 55.56%，下降 6 個百分點(表 2)，Covid-19 疫情期間住家被竊增減變動與土地使用有關。

表 1 臺北市住宅竊盜統計（2019 年）

	住宅竊盜									
	發生件數			破獲件數			犯嫌人數	被害人人數		
	108年01至12月	增減數		108年01至12月	增減數		計	計	男	女
合計	438	0	438	445	0	445	371	457	223	23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0	0	0	14	0	14	13	0	0	0
中山分局	56	0	56	52	0	52	42	57	22	35
大安分局	63	0	63	65	0	65	53	66	33	33
中正一分局	6	0	6	5	0	5	5	7	4	3
中正二分局	25	0	25	20	0	20	14	27	14	13
文山一分局	15	0	15	15	0	15	12	16	9	7
文山二分局	9	0	9	10	0	10	8	9	6	3
南港分局	25	0	25	24	0	24	22	23	10	13
內湖分局	36	0	36	35	0	35	31	38	18	20
北投分局	49	0	49	37	0	37	32	51	23	28
士林分局	43	0	43	50	0	50	40	45	22	23
信義分局	20	0	20	20	0	20	14	21	12	9
松山分局	20	0	20	23	0	23	20	22	9	13
大同分局	22	0	22	24	0	24	20	24	10	14
萬華分局	49	0	49	51	0	51	45	51	31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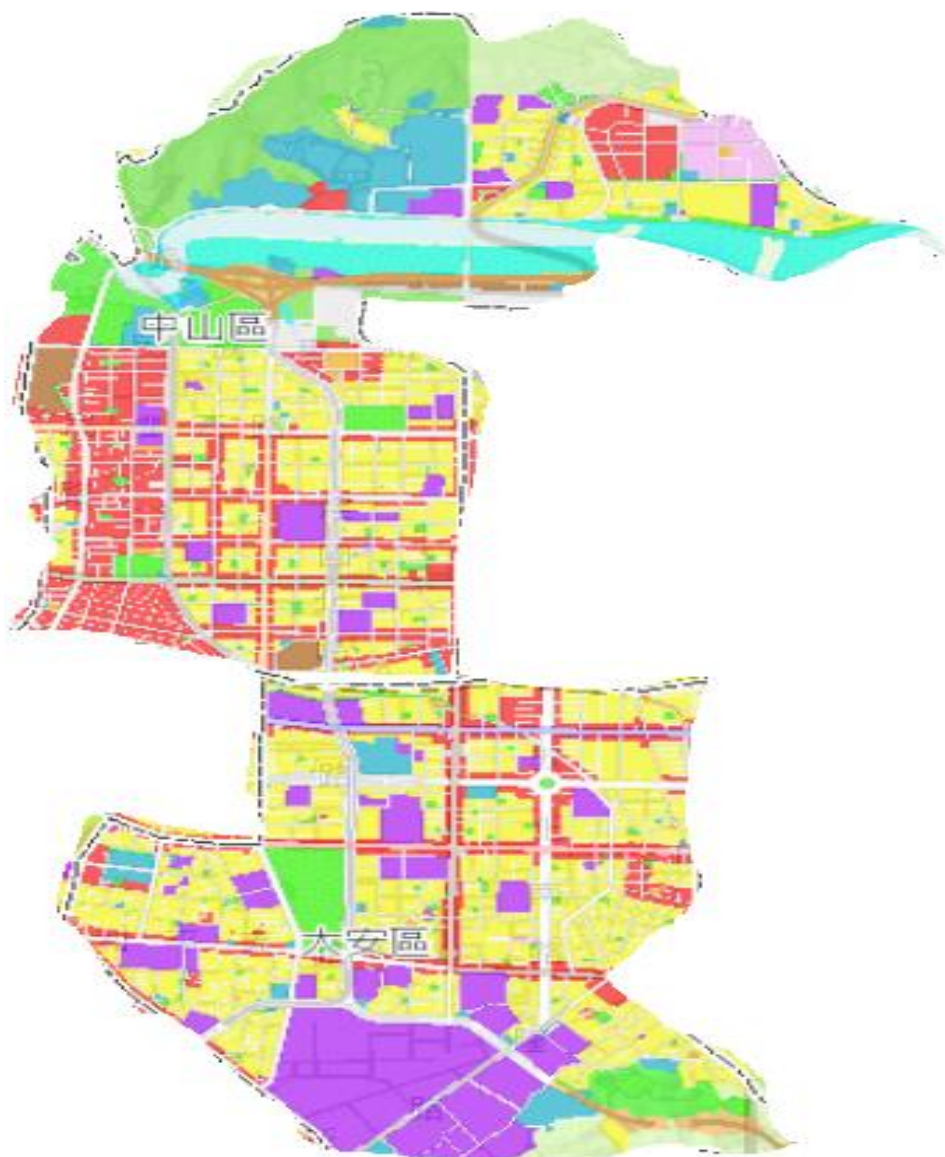


圖 1 臺北市中山區/大安區土地使用情形

表 2 臺北市中山區住宅竊盜土地使用分區

	2019/5/17-2019/9/27		2020/5/17-2020/9/27		2021/5/17-2021/9/27	
	件數	(%)	件數	(%)	件數	(%)
住宅區	5	38.46	0	0.00	4	44.44
商業區	8	61.54	12	100.00	5	55.56
總計	13	100.00	12	100.00	9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盼望藉本土研究與犯罪理論對話，且考量案類混合分析結果(mixed results)不具政策意涵下，本研究探究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因為「家」不僅是一個人安身立命最穩妥的避風港，需於平時防備家宅被竊，防疫時期也是私密領域隔離的最後防線，而當城市開放空間被封鎖，半開放環境開創了社交環境時，住家半開放空間也成了人與人情感聯繫不被孤立的必要活動領域，然當被外人侵犯、住家生活次序被破壞，以及連結個人意義自我價值的物品被竊取，甚至防疫物資備品被竊時，「家」不再是安全保障的窩，在其心裡埋藏的恐懼，已非財產價值損失所能計算，亦非 Covid-19 疫情消長所能掩蓋，故要成為本研究之命題。

Warr 及 Stafford(1983)在華盛頓的調查顯示住家被竊恐懼為 16 種被害恐懼之首，Clarke 和 Hope(1984)發現住宅被竊者長期處於擔心未來住家會被侵犯的恐懼中，他們需要恢復長期的安全感而非僅有立即的處理。住家被竊者有無盡的恐懼，非客觀刑案數據所能表達，因他們認為最安全的領域已被侵犯，此種恐懼感的獨特性在於心理創傷無法以避免其他被害恐懼感的方式來調適 (Brown & Harris, 1989)。然鮮少探討住家及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且因概括性被害恐懼的實證研究，如：Ferraro(1995)等，政策效果常是混合的 (Yim & Riddell, 2024)，本研究盼望透過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球必須封城因應下，以環境犯罪學實證引發住家及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住領域感安全的重要性，在脫離疫情流行下略盡犯罪防治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推動之責任。

貳、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一、環境、日常活動與犯罪被害的關聯

環境犯罪學大多關心犯罪事件，有別於一般傳統犯罪理論關心犯罪人為何犯罪(Bottoms, 1994)，認為犯罪的發生是犯罪人要在適當的時間與地點所形成的犯罪機會下才能犯罪(Cloward, 1959; Cullen, 1983)，因此，環境犯罪學又稱新機會理論，以犯罪機會的變化來解釋犯罪型態和數量的變化，而犯罪機會的變化包括合適標的物、方法工具及情境，均屬於環境變化所造成，包括：日常活動理論、生活型態理論及理性選擇理論，而本研究以日常活動理論為主。日常活動理論認為，犯罪要發生必須要有三項要素（有動機的嫌疑犯、有合適的標的物、監控者的缺乏）在時、空的聚合，有動機的犯罪者是既有存在的，而適合的標的及監控在犯罪機會中是變異的，適合的標的在於嫌犯認為對他有好處，而監控在於成本考量，此兩者就存在人們每天生活家庭、工作、休閒及消費的日常活動當中，因此犯罪發生不在社會病態(pathological social condition)出現，而只是因為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變(Cullen et al., 2018)。當日常活動改變，犯罪率即受到影響，比如 Cohen 和 Felson(1979)指出二次大戰後婦女就業率提高、在家時間減少，日常活動普遍改變下，有動機的家宅竊盜嫌犯利用家中無人監控時更有可能竊取合適標的物，因為婦女上班後住家缺乏監控，就給住宅被竊開創了犯罪機會，也因此使犯罪率上升(Clarke & Felson, 1993; Felson, 1995)。

21 世紀中國引發的新冠肺炎全球 667 萬人死亡，全球採行抑制政策，包括：國內及國際旅遊的限制、居家防疫及社交距離管制等，帶來了日常活動的改變，總體犯罪及各類犯罪也因而變動，引發不少犯罪學的研究，研究結果整體而言犯罪率下降，但在不同案類及各國有差異：Yim 和 Riddell(2024)發現舊金山在居家防疫(stay-at-home)管制下商業竊盜(commercial burglary)增加且熱點分布移動；Murdoch 和 Byczynski(2021)顯示 2020 年春天倫敦與紐約封城(lockdown) 期間犯罪趨勢不相似，亦發現倫敦各案類犯罪下降但紐約僅一般竊盜與強姦減少；Felson 等人(2020)檢視密西根底特律在 Covid-19 抑制(containment)政策下封城前中後三階段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住宅區侵入竊盜(burglary)下降但土地混合使用區之侵入竊盜則上升；Pietrowska 等人(2020)發現 Los Angeles 零售業侵入竊盜增加但城市內侵入竊盜下降。歐洲方面

則有 Gerell 等人(2020)發現瑞典抑制政策下，住宅及商業侵入竊盜均下降。從以上研究歸納出封城使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不同空間土地使用（開放空間、商業區、住宅區等）上的人流自然監控，造成不同犯罪類型犯罪標的被害機會改變而引起不同空間不同類型犯罪的增減(Stickle & Felson,2020)。而本土研究伍大開和黃勢璋(2023)除了發現臺灣在三級警戒¹期間總犯罪率下降 21%，再加以探討不同案類被害者年齡後發現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的 30-59 歲被害人數相較於其他年齡層明顯減少，地區別方面直轄市犯罪數下降的規模亦高於非直轄市。

二、環境犯罪預防

以上日常活動理論似乎解釋了犯罪機會如何在嫌犯及被害者的日常活動中出現，但從以上實證結果無法瞭解影響不同犯罪被害類型的因素而存有研究缺口，難以進行犯罪被害預防，而從日常活動理論引發的情境犯罪預防中，防衛空間理論聚焦在如何透過物理實體空間設計安排減少犯罪，此理論源自 Jane Jacobs(1961)、Elizabeth Wood(1961)、C. Ray Jeffery(1971)及 Oscar Newman(1972)透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防衛空間理論(Oscar Newman's defensible space theory)，係「經由環境設計促進犯罪預防(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認為建築環境的正確使用和有效設計，可導致犯罪發生減少，並改善生活品質。Newman(1972)開啟「防衛空間」的概念，是透過實體設計(physical layout)及其他建築特色，開創自然監控增加居民使用，讓居民在住家及其環境生活感到較安全，這惟賴居民共同致力於捍衛此領域才得以保障。Newman 並於 1973 年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中指出：「防衛空間為一種機械式(兼含實體或虛構性的阻絕物)犯罪預防措施之代名詞，以產生影響或促進監控力量(亦即結合環境與居民控制之力量)之機會為重點」；其為一種藉由在犯罪發生前營造硬體障礙措施、提高加害者暴露之機會、並提升加害者心中被逮捕可能性之犯罪預防措施(Newman,1973；黃富源、張平吾，2012；鄧煌發、李修安，2015)。Lab(2013)發現政策制定者已採用防衛空間、環境設計(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如：清除住家環境髒亂塗鴉(Skogan & Maxfield, 1981)、增加街道照明(Painter, 1996)、裝設錄影監視器

¹ 2021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 26 日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Short & Ditton, 1998)。環境犯罪學視角下的防衛空間理論認為，透過都市設計預防犯罪是在環境設計與犯罪關係中一個具體明確有效的理論。因此，Cullen et al.,(2018)指出此論點開啟一個新的犯罪預防方向，因為當遏止犯罪發生因素（犯罪人、犯罪機會）的其中一個即能預防犯罪，而環境犯罪學者認為降低犯罪機會較改變一個犯罪人更容易，也更有可能是犯罪預防施行策略。爰此，本研究採環境犯罪學（亦稱機會理論）視角聚焦在解釋犯罪被害事件，以及發掘物理的和社會環境特徵如何影響犯罪被害機會的可得性讓犯罪被害發生，進而假設有效降低犯罪被害（如：侵入竊盜被害）的方法可以透過開創防衛空間領域感、增加監控等情境犯罪預防以及強化鄰里集體效能來達成犯罪防治之果效。

針對 Covid-19 居家防疫期間住家被竊情形而言，Payne 與 Morgan(2020)發現侵入竊盜未有顯著變動，且影響了人們每天對公、私空間的使用，Google's 移動資料顯示，抑制政策使 4 月中公共空間（包括：公園、零售、休閒、工作場所、車站等）拜訪次數較 1、2 月顯著下降，而花在住家的時間則增加 20%。在臺灣臺北市中山分局轄內於 2021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 日居家防疫期間侵入住宅竊盜相較於疫情發生未全面居家辦公（2020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減少 3 件，係商業區減少 7 件，然住宅區住家被竊增加 4 件；若與疫情發生前（2019 年 5 月 17 至 9 月 27）相較乃減少 4 件，係商業區減少 3 件，住宅區減少 1 件。整體而言，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辦公期間侵入竊盜減少，但住宅區發生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提高，Brantingham 和 Brantingham(1995)描述犯罪是在平常生活中嫌犯最常拜訪的地方突然導火事件的發生，而非必要額外活動尋找犯罪標的，是以機會為本質的，強調犯罪引誘者(attractors)及促發者(generators)，比如：合法的夜店、大型購物中心、停車場、毒品市場等犯罪熱點，而這些地點型態會受抑制政策改變日常活動，而改變犯罪的不平衡分布，亦即抑制政策下關閉了土地商業用途的娛樂場所、咖啡館等，伴隨著商業竊盜減少而住宅環境自然監控增加下住宅竊盜減少，然而開放空間（因減少工作或在學校）塗鴉、公物毀損卻增加。當抑制政策實施一段期間後自然出現不守法的行為、青少年偏差非行等（Stickle & Felson, 2020），自然削弱封城政策帶來的改變，長期也帶來失業、焦慮及緊張，依據 Agnew(1992)一般緊張理論預期犯罪將增加，且已在澳洲昆士蘭家戶竊盜顯出（Payne & Morgan,2020），除提供警政資源有效運用參考，也因空間土地使用改變影響住宅區及商業區犯罪被害事件的發生，適可提供都市計畫、居住安全決策者

參考，尤其居家辦公期間居民更需要住家半開放空間作為人際互動、身體活動的基本生活領域，然過往研究缺乏住家半開放空間之實證論述，面對疫情期間公共空間人流的消失讓城市顯得荒廢不健康、失落、被孤立隔離下，探討住家半開放空間領域感、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有其必要性，進而透過都市計畫、建築管理進行犯罪防治以營造居住安全。

三、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住家被竊對心理的影響可採 Janoff-Bulman(1992)損毀的(Shattered)假設理論來解釋，亦即悲痛的事件導致一個人對世界、他人及自己基本假設的損毀，例如：當我們突然失去獨生愛子或配偶，導致我們喪失母親、妻子角色時的撕裂。Janoff-Bulman(1992)將該理論應用在犯罪受害者，並結合 Altman(1975)領域感(territoriality)探討住家被竊，認為人們視「家」為主領域(Primary territoriality)是自我的延伸，且在此受保護，一旦被侵犯將因此信念被摧毀而經歷創傷壓力失調(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及其他種心理傷痛(Basdeo, 2020)，包括：犯罪被害恐懼(Doyle et al., 2021)、焦慮與沮喪(Kilian et al., 2021)，而這些心理傷痛最終會造成行為問題，如：退出(withdrawal)或侵略(aggression)(Ramey & Harrington, 2019)。可見，住家被竊對心理的影響深遠值得探討。

然考察過往文獻係將主領域界定在私人有權管轄的領域，如：Brown 和 Harris(1989)以領域感理論(territoriality theory)探討住家被竊經驗，人們會對主領域(如：家)較次領域(如：鄰里街道)期待更多掌控與親近(Brown & Altman, 1981)，Taylor(1987)指出「家(Home)」以實體建築及地景與公領域分隔，是絕不容侵犯的，法律並以制裁犯行保護住家安全，讓居民能在家中得到心理的益處，也在每天生活的隱私保障中得以放鬆。進一步 Csikszentmihalyi 及 Rochberg-Halton(1981)以及 Harrison(1998)提到居民會對家中物品賦予價值和意義，表達個人對過去的生活經歷人事物的情感連結與成就感，並藉此定義自我(self)。

雖然住宅竊賊想要得到財務上有價值的物品，而這些物品通常有感情的連結(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本研究認為當居民住家遭竊，心理損失遠大於財務金錢損失，而 Brown 和 Harris(1989)針對住宅被竊恐懼感提出兩個適應策略(coping strategies)與領域本質(territorial nature)有關，一為朝向鄰里的行為改變

(neighbor-oriented behavior changes)，如：藉由人際接觸強化領域監視，Avery 等人(2020)發現當被竊者能在鄰里調適中感受社區凝聚力(cohesion)內心痛苦即會降低；二為朝向自家的行為改變(self-oriented behavior changes)，如：安裝警報器等，但此策略在調適被竊恐懼感上並無證實有效，事實上反而是帶來更大的恐懼(fear)、不安(upset)及氣憤(anger)(Rosenbaum, 1987)。另外 Chung 等人(2014)發現當住家被竊時被害者在家將不會經歷創傷壓力失調(PTSD)及恐懼感，而 Kunst 和 Hoek(2023)系統化檢視住家被竊者可能風險及保護因子後發現，限於理論及研究方法此實證結果尚無定論。爰此，住家被竊對個人衝擊極深，以環境犯罪被害視角觀察，住宅半開放空間已成為居民日常活動主領域下，其風險與保護因子，是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的。

四、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

以下整理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

- (一)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Skogan(1987)、Smith 和 Hill(1991)、Dull 與 Wint(1997)等聚焦在過去被害經驗對被害恐懼感的影響，被害者或曾經具有被害經驗者，因其被害經驗非常的強烈或印象深刻，而有較高的犯罪被害恐懼感(Garofalo, 1979; Hale, 1996; Lai et al., 2012; Skogan & Maxfield, 1981; 洪千涵等人, 2014; 陳玉書、邱炫綿, 2006)。Ferraro(1995)指出，住宅竊盜使被害者產生居家環境不安全感，是絕大多數民眾最害怕之案件。Wilcox Rountree 和 Land(1996)、Wilcox Rountree(1998)、Lai 等人(2012)實證研究均顯示住家犯罪被害將造成個人及家人的被害恐懼感，然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引發之被竊恐懼感研究卻付之闕如，將納入本研究架構、假設及問項中。
- (二) **傳聞失序經驗：**本研究主領域不僅在住家內，亦包涵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因此本研究認為傳聞失序經驗可能影響其被竊恐懼感。Warr(1984)指出人們在特定狀態地方，特別是昏暗、失序(disorganized)、荒廢破損失修(disrepair)處會感到較高的恐懼感。社區失序程度愈高，顯著影響居民犯罪被害恐懼感的增加(Gibson et al., 2002; Renauer, 2007; Scarborough et al., 2010; 洪千涵等人, 2014; 陳玉書、邱炫綿, 2006)。個人在住家鄰里聽聞被害或失序的經驗將影響犯罪被害恐懼感(Gibson et al., 2002)。Fleissner 及 Heinzelmann(1996)建議警民合力清除社區腐敗(decayed)並加以整頓可以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並增進鄰里凝聚力

(neighborhood cohesion)。然而，Hinkle 及 Weisburd (2008)發現愈多警察出現在鄰里控制失序反而降低居民知覺的安全感。

- (三) **集體效能**：係指社區居民基於社區的利益願意團結起來的社會凝聚力 (Sampson et al., 1997)，當社區居民能相互信任團結一致，集體效能體現的結果犯罪被害恐懼感會降低 (Ferguson & Mindel, 2007; Zhao et al., 2015; 楊雅琳、賴擁連, 2020)，係從以上探討傳聞失序經驗對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中帶出，Swatt 等人 (2013) 指出不同文化種族鄰里脈絡下知覺的集體效能與犯罪被害恐懼感之關係存在異質性(heterogeneity)。Frimpong 等人(2018)發現集體效能在低所得鄰里居民之犯罪被害恐懼感上有較強的中介效果；Yuan(2017)則利用多層級模式(multilevel model)研究西雅圖鄰里發現，在個人層級知覺集體效能對住宅竊盜犯罪被害恐懼感有負向影響但在鄰里層級則有正向影響。國內研究如陳淑娟和董旭英(2006)及翁國峰(2007)則發現，集體效能愈高的地區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可能是居民感受到犯罪被害恐懼感而產生對社區團結與控制的集體效能。本研究採臺北市中山區資料恰可與國內實證進行對話。

- (四) **保全監視**：陳淑雲 (2012) 指出人類很早就意識到經由環境的運用，可以為自己和家人提供安全性。例如古代文明建立在山上設有圍牆的城市，通道以堅固的大門控制，城堡被護城河包圍，而居民唯一通道是一座吊橋。即使是美國最早的定居者，亦以堡壘築城，他們所做的就是「經由環境設計促進犯罪預防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CPTED)」的防衛，Jacobs(1962)和 Newman(1972,1973)的理念是物理環境特質(physical features)能夠在公共及私人空間提供較好的監視(surveillance)及描繪(delineation)，住家外空間分割後由小群體控制並在鄰近周圍環境良好地使用，有較強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將會減少偏差行為、被害及恐懼感。例如：住家裝設安全裝置、改善住家環境街道照明、裝設 CCTV 及住家環境公共區域改善等，然 Lorenc 及其同事(2013)檢視其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的效果是混合(mixed)的，因此本研究聚焦在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適可填補本土實證研究缺口並供政策實務參考。

- (五) **領域感**：為物理環境開創知覺領域影響範圍的能力，是空間傳達被擁有或私有清楚知道如何使用的程度(Newman, 1972)。Newman(1980)指出當建築規模愈大，居民使用住家環境公共空間頻率愈低，將造成愈多犯罪及犯罪被害恐懼感。

Foster 等人(2010)發現人們愈多使用鄰里開放空間從事各樣活動愈能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Covid-19 疫情期間 Batty(2020)及 Brumfield 和 Cubillos(2020)發現人們保持社交距離並在家上班、分散密集活動區可以找回封城下的城市呼吸(breath)不至於窒息，亦即住家環境開放空間(公園、綠地、自行車道等)的社交療癒潛能(較好的空氣品質、更多實體活動)，讓安全(safety/ security)的意義超越 Oscar Newman 防衛空間理論中的私有領域，提醒現代都市規劃必須推進公共半開放空間的投資，讓城市空間混合使用以提升福祉及永續性。Young, A.(2021) 分析 2020 年 Covid-19 流行時封鎖的城市，檢視人們如何透過感覺及空間詮釋建構與適應封城的空間與感覺，提出感知的重要，作為封城結束後對城市空間重新概念化、定位及設計的新生命。Warwick 和 Lees(2022)找到流行疫病下安全的新概念是快速的空間改造、協調，迫使我們再次思考領域感及安全感，並體認到住家的領域被改變了，門、窗都被打開作為隱私與所有權的妥協，在社交距離下住家環境的公共空間有合宜的活動，而社交舉止(social ritual)如：向侵入陌生人點頭示意等，可以克服不清楚的領域感，半私人、半公共及公共空間可以被開創在密集的都市環境中重塑成為合宜舒適安全的居家環境，因此本研究該變項所代表的概念，與過往非疫情時期下的測量結果有不同的意涵與價值。

五、小結

日常活動改變造成犯罪被害發生時間、地點的改變，如同 Covid-19 造成侵入竊盜發生時空之改變，也因封城使人們活動空間轉移，此為 21 世紀全球空前的改變，醞釀著本世紀學術研究另類場域，本研究遂提點半開放空間之重要性，是過往文獻未研究的，從個人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可能產生被竊恐懼感，再考量鄰里層面傳聞失序及集體效能，並以防衛空間理論中領域感及保全監視等作為情境犯罪預防之基礎下，建立研究架構及假設，探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影響，尤其本研究懷疑鄰里層面傳聞失序及居民被竊經驗會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影響被竊恐懼感，故透過結構方程模型中的路徑分析進行實證研究。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關於 Covid-19 疫情對犯罪的影響，文獻顯示各研究都存有樣本不具代表性無法推論至全球的限制(Murdoch & Byczynski, 2021)，Stickle 和 Felson (2020)仍鼓勵研究者針對特定犯罪類型比較不同犯罪發生地土地使用分區，抑制政策之影響，好能藉此思考未來如何讓犯罪減少讓人民居住更安全。本研究盼望藉本土研究與過往文獻對話，且考量案類混合分析結果(mixed results)不具政策意涵下，本研究聚焦在主觀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希冀補足犯罪被害學術研究之缺口，進而能對過往所輕忽之居住半開放空間之被害恐懼感予以重視。

根據犯罪被害理論及文獻整理建立本研究架構(如圖 2)，探討住家及其環境(圖表內以住家/環境表示)被竊經驗、傳聞失序、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對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影響因子與路徑。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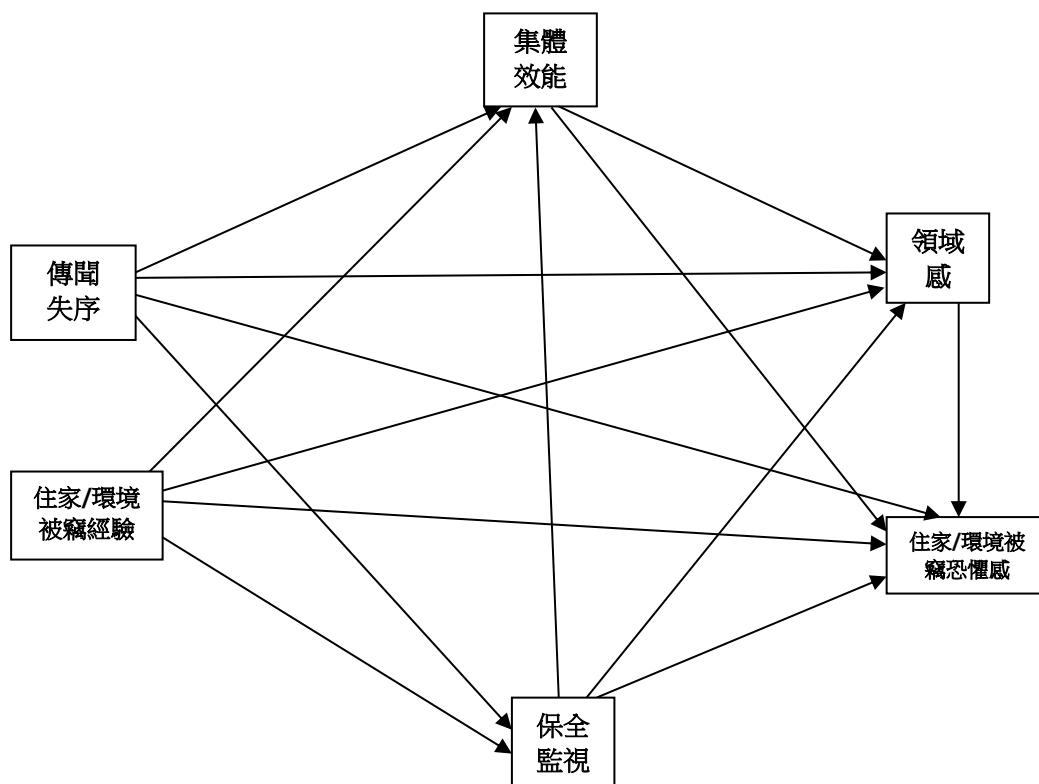


圖 2 本研究架構圖

研究假設：

- 1-1.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直接影響其恐懼感。
- 1-2.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中介影響其恐懼感。
- 2-1.傳聞失序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2-2.傳聞失序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3-1.集體效能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3-2.集體效能透過保全監視、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4-1.保全監視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4-2.保全監視透過集體效能、領域感中介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 5.領域感能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針對臺北市中山區居民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調查，以里分層並以性別控樣，各里樣本數則依各里人口比例分配，由研究者親至各里訪問 12 歲以上居民，亦有留置問卷於里辦公處並致贈受訪者紀念品鼓勵居民填答問卷，2020 年 5 月 16-17 日進行預試 10 份問卷並修改後，於 5 月 25 日至 7 月 25 日進行調查，總計有 234 位願意接受訪問(如表 2)，男性 96 位、女性 138 位²；12 歲-未滿 24 歲 28 人、25 歲-未滿 65 歲 138 人、65 歲以上 68 人。

本研究問卷係採自陳四點量表，受訪者在擬具問卷同意書後始進行施測，問卷設計參考陳淑娟、董旭英(2006)，分為六部分訪問受訪者或家人在住家或住家附近曾經親身經歷到的：第一部分為住戶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傳聞失序及個人以及同住的家人被竊經驗、第三部份為廣義領域感（含集體效能）、第四部分住家環境監控情形、第五部分犯罪被害恐懼感。

依變項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測量共 2 題，包括：(1)我會擔心被偷走物品及錢財。(2)我會擔心被搶走物品及錢財。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 分、「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 分，因此該變項所取的值愈高，其

²性別與母體結構一致(卡方檢定 $p=0.088>0.05$)。

犯罪被害恐懼感程度愈高。以此 2 題項建構的「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特徵值 1.659、解釋變異量 82.932%，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907。

表 3 臺北市中山區各里樣本份數

里別	次數	百分比(%)	里別	次數	百分比(%)
正守里	3	1.28	新生里	6	2.56
正義里	8	3.42	中庄里	6	2.56
正得里	5	2.14	行政里	6	2.56
民安里	5	2.14	行仁里	3	1.28
康樂里	3	1.28	行孝里	5	2.14
中山里	10	4.27	下埤里	6	2.56
聚盛里	6	2.56	江寧里	7	2.99
集英里	7	2.99	江山里	10	4.27
聚葉里	6	2.56	中吉里	6	2.56
恆安里	6	2.56	中原里	8	3.42
晴光里	7	2.99	興亞里	3	1.28
圓山里	2	.85	中央里	6	2.56
劍潭里	3	1.28	朱馥里	6	2.56
大直里	10	4.27	龍洲里	4	1.71
成功里	5	2.14	朱園里	5	2.14
永安里	9	3.85	埤頭里	4	1.71
大佳里	1	.43	朱崙里	6	2.56
新喜里	5	2.14	力行里	7	2.99
新庄里	1	.43	復華里	6	2.56
新福里	4	1.71	金泰里	8	3.42
松江里	8	3.42	北安里	2	.85

註：本研究整理

自變項有五，分述如下：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 2 題，包括：(1)曾被偷走物品及錢財。(2)曾被搶走物品及錢財。原四點量表重新將「經常」、「偶爾」、「很少」編碼為 1，代表有被竊經驗，「從未發生」編碼為 0，代表沒有被竊經驗，特徵值 0.755、解釋變異量 37.755%、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513。

傳聞失序測量 2 題，包含：(1)曾看見或聽聞有人吸毒。(2)曾看見或聽聞有人醉酒。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經常」4 分、「偶爾」3 分、「很少」2 分、「從未發生」

1 分，因此 2 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傳聞失序經驗程度愈高。「傳聞失序經驗」特徵值 0.974、解釋變異量 48.693%、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652。

集體效能測量共 12 題，包括(1)我會協助管理或清掃我家附近的區域。(2)我常與鄰居閒話家常。(3)我認識大部分的鄰居。(4)整體而言，我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5)我能提供鄰居一些建議與意見。(6)我會照顧其他鄰居的小孩。(7)我常常與鄰居一起活動，如：爬山、買菜、唱歌、跳舞。(8)若有需要，我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9)整體而言，我和鄰居很親近。(10)我需要幫助時，鄰居都會伸出援手。(11)我家附近居民會定期舉辦居民活動。(12)整體而言，我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 分、「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 分。因此 12 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認知集體效能的程度愈高。「集體效能」指標特徵值 6.152、解釋變異量 51.263%、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925。

保全監視測量共 4 題，包括(1)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公共空間設有緊急救援裝置。(2)入夜後，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一些特定出入口有保全人員。(3)我家附近及建築內有足夠的監視系統設備，如：監視器。(4)我家附近及建築內有張貼與保全聯繫的警戒標誌。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 分、「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 分。因此 4 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保全監視」指標特徵值 1.642、解釋變異量 41.045%、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723。

領域感測量共 2 題，包括(1)我感覺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無法隨意進入，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4 分、「符合」3 分、「不符合」2 分、「非常不符合」1 分。(2)我感覺我的住處(社區或大樓等)散發出無人管理的氣氛，係為負向測量，四點量表計分方式依序為「非常符合」1 分、「符合」2 分、「不符合」3 分、「非常不符合」4 分，以求得變項測量一致性。因此該 2 個題目加總後所得的值愈高，其領域感認知程度愈高。「領域感」指標特徵值 1.054、解釋變異量 52.724%、信度係數 Cronbach alpha 值 0.691。

肆、研究結果

利用 spss 軟體針對居民受訪結果進行統計，結果整理於表 4：依變項「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由 2 個項目組合而成，將受訪者在上述 2 題分數加總後除以 2(以下分量表因素分數計算方式同此)，得到「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分數，平均數 2.88，整體而言仍存在被竊恐懼感。自變項方面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中，被竊 18 人占 10% 呈現偏態，透過 SQRT 的方式轉變成常態分布。傳聞失序經驗方面受訪者在分量表平均數 1.82，集體效能分量表平均數 2.88，保全監視分量表平均數 2.75，領域感分量表平均數 2.92。以上變數（如表 4）為連續均經過常態分布檢驗，可以進行積差相關及結構方程模式，進而得到相關係數（如表 5）及路徑係數與模型圖（如圖 4）。

表4 住家環境被竊及其恐懼感敘述統計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偏態	峰度	最小值	次數	最大值	次數
住家/環境被竊(SQRT)	0.238	0.366	9.939	0.989	-0.805	0.000	162	1.000	18
傳聞失序	1.818	0.753	36.951	0.583	-0.590	1.000	74	4.000	2
集體效能	2.881	0.511	86.221	-0.392	1.015	1.000	1	4.000	4
保全監視	2.748	0.567	74.148	0.000	-0.115	1.250	2	4.000	8
領域感	2.918	0.618	72.248	-0.606	0.179	1.000	1	4.000	17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	2.883	0.741	59.540	-0.293	-0.225	1.000	7	4.000	41

註:本研究整理

表5 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矩陣係數

	住家/環境被竊(SQRT)	傳聞失序	集體效能	保全監視	領域感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
住家/環境被竊(SQRT)	1.000					
傳聞失序	0.315***	1.000				
集體效能	-0.069	0.047	1.000			
保全監視	-0.140*	-0.200**	0.193**	1.000		
領域感	-0.232***	-0.293***	0.211***	0.384***	1.000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	0.197**	0.046	0.132*	0.049	-0.018	1.000

備註：*表示 $p\text{-value} \leq 0.05$ ；**表示 $p\text{-value} \leq 0.01$ ；***表示 $p\text{-value} \leq 0.001$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傳聞失序」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315$ ； $p\text{-value}=0.000$ ），表示傳聞失序情況愈多住家及其被竊經驗亦愈多。「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保全監視」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140$ ； $p\text{-value}=0.037$ ），表示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少。「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領域感」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232$ ； $p\text{-value}=0.000$ ），表示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意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少。「住家及其環境被竊」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197$ ； $p\text{-value}=0.003$ ），表示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多，「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加增。

「傳聞失序」與「保全監視」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200$ ； $p\text{-value}=0.003$ ），保全監視系統設施愈多傳聞失序經驗愈少。「傳聞失序」與「領域感」呈負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293$ ； $p\text{-value}=0.000$ ），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意進入、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傳聞失序經驗愈少。

「集體效能」與「保全監視」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193$ ； $p\text{-value}=0.004$ ），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愈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愈感覺住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集體效能」與「領域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211$ ； $p\text{-value}=0.001$ ），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

意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愈會信任鄰居及其他住戶、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愈感覺住家附近居民都能互相幫助。「集體效能」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132$; $p\text{-value}=0.049$)，居民愈擔心物品被偷走搶走愈願意幫助鄰居解決問題。

「保全監視」與「領域感」呈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 ($r=0.384$; $p\text{-value}=0.000$)，認知保全監視系統設置情形愈充足，居民感覺住處(社區或大樓等)陌生人愈無法隨意進入、愈散發出有人管理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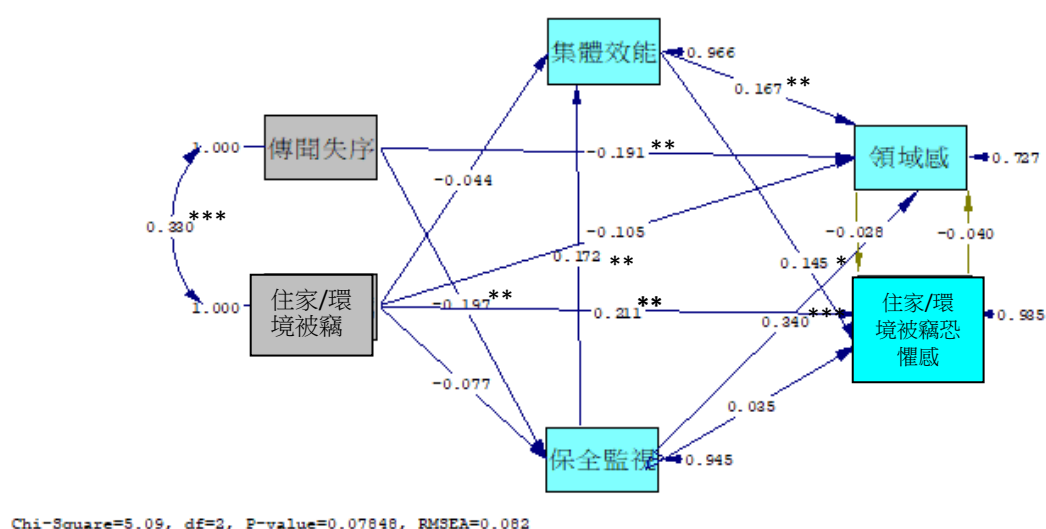


圖3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結構方程模型圖

參數估計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進行估計，耗費9次疊代，外衍潛在變項(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傳聞失序)共變估計顯著 ($\Psi=0.09$ 、 $t=4.77$ 、 $p<0.001$)，而結構模型對於內衍潛在變項(集體效能、保全監視、領域感、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的解釋力(類似 R^2 的功能)以領域感解釋27.3%最多。契合度分析數據顯示整體模型適合度理想，考驗得到卡方值為5.09 ($df=2$ 、 $P=0.078>0.05$)、卡方自由度比為 $2.073>2$ 、RMSEA值為 $0.082<0.1$ ；NFI=0.966、GFI=0.977、AGFI=0.924均大於0.90、CFI=0.977>0.95，且由Lisrel8.8 MI(Modification Indices)檢查，已無任何建議參數。根據標準化總效果發現住家及其環境被竊對領域感有負向影響 ($\gamma=-0.15$ 、 $t=-2.27$ 、 $p<0.05$)，且增強其恐懼感 ($\gamma=0.20$ 、 $t=3.17$ 、 $p<0.01$)；傳聞失序對保全監視 (γ

$=-0.20$ 、 $t=-2.90$ 、 $p<0.01$)及領域感($\gamma=-0.26$ 、 $t=-4.08$ 、 $p<0.001$)有負向影響；集體效能增強了領域感($\beta=0.16$ 、 $t=-2.82$ 、 $p<0.01$)及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beta=0.14$ 、 $t=2.17$ 、 $p<0.05$)；保全監視增強了集體效能($\beta=0.17$ 、 $t=2.63$ 、 $p<0.01$)與領域感($\beta=0.37$ 、 $t=6.24$ 、 $p<0.001$)，唯有領域感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beta=-0.03$ 、 $t=-1.07$ 、 $p>0.05$)，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同時也降低了領域感($\beta=-0.04$ 、 $t=-1.07$ 、 $p>0.05$)但不顯著。

將所有標準化效果整理於表6發現，第一、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除直接顯著增加被竊恐懼感0.211外；同時透過集體效能間接中介領域感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惟不顯著；加總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對其恐懼感直接及間接效果後之總效果0.204仍顯著，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愈多其被竊恐懼感愈高，研究假設1-1及1-2均成立。第二、傳聞失序不直接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研究假設2-1不成立；傳聞失序係透過保全監視→集體效能→領域感間接中介緩和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004)惟不顯著，研究假設2-2部分成立。第三、集體效能直接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145；透過領域感間接緩和被竊恐懼感(-0.005)惟不顯著；加總直接及間接效果後之總效果0.140顯著，集體效能愈高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高，研究假設3-1及3-2均成立。第四、保全監視直接增加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035惟不顯著；亦透過集體效能及領域感使被竊恐懼感增加0.015仍不顯著；加總直接及間接效果後之總效果0.049不顯著，增加保全監視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提高，研究假設4-1及4-2部分成立。第五、領域感能直接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0.028但不顯著，研究假設5部分成立。

表 6 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路徑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			
		集體效能	保全監視	領域感	住家/環境被竊恐懼感
外 衍 變 項	住家/環境被竊				
	直接效果	-0.044	-0.077	-0.105	0.211**
	間接效果	-0.013		-0.044	-0.007
	總效果	-0.057	-0.077	-0.149*	0.204**
	傳聞失序				
	直接效果		-0.197**	-0.191**	
	間接效果	-0.034		-0.072**	-0.004
	總效果	-0.034	-0.197**	-0.263***	-0.004
	集體效能				
	直接效果			0.167**	0.145*
內 衍 變 項	間接效果			-0.006	-0.005
	總效果			0.161**	0.140*
	保全監視				
	直接效果	0.172**		0.340**	0.035
	間接效果			0.027	0.015
	總效果	0.172**		0.367***	0.049
	領域感				
	直接效果				-0.028/-0.040
	間接效果			0.001	0.000
	總效果			0.001	-0.028/-0.040

 備註：*表示 $p\text{-value} \leq .05$ ；**表示 $p\text{-value} \leq .01$ ；***表示 $p\text{-value} \leq .001$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主要發現

本研究利用本土疫情期間觀察首善之區臺北市居家辦公對住宅被竊影響，考量臺北市中山區是臺灣的一個繁華地區，兼具富饒的住宅區和商業區而整理該分局於2021年5月17至9月27日居家防疫期間之「住宅防竊安全檢測報告表」，整體而言，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期間侵入竊盜減少，與Ashby(2020)發現Austin、Los Angeles、Memphis、San Francisco 侵入竊盜下降，Murdoch 和 Byczynski(2021)發現倫敦侵入竊盜下降，及Gerrell 等人(2020)發現瑞典抑制政策下，住宅及商業侵入竊盜均下降相同。進一步發現臺北市中山區住宅區相對商業區發生被竊比例提高，住宅竊盜增減變動與土地使用有關，與Felson 等人(2020)檢視密西根底特律在Covid-19 抑制(containment)政策下封城前中後三階段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住宅區侵入竊盜(burglary)下降但土地混合使用區之侵入竊盜則上升不同，存在文化差異，可能係我國住宅區常是住商混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差異所致，但與Pietrawska 等人(2020)發現Los Angeles 零售業侵入竊盜增加但城市內侵入竊盜下降同，係因居家辦公使日常活動改變，影響不同空間土地使用（開放空間、商業區、住宅區及半開放空間等）上的人流自然監控，造成侵入竊盜標的被害機會改變而引起住宅竊盜發生變動，與Cohen 和 Felson(1979)日常活動理論、Brantingham 和 Brantingham(1995)機會理論等環境犯罪學契合。亦如Payne 與Morgan(2020)以時間序列動態預測澳洲昆士蘭抑制政策長短期下各種財產犯罪增減情形，發現侵入竊盜未有顯著變動，除了抑制政策實施一段期間自然出現的違序不守法，造成半開放空間住宅竊盜外，也因Covid-19 疫情防疫抑制帶來失業、焦慮、緊張而發生的住宅竊盜，如同臺北市中山區2021/5/17-2021/9/17較2020/5/17-2020/9/17住宅區住宅竊盜增加4件之現象，係Agnew (1992)一般緊張理論所能解釋。

接下來探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透過結構方程模型利用Lisrel8.8 統計結果瞭解Covid-19 疫情期間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之因子及路徑以及如何降低此恐懼感。影響因子：第一、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顯著增強其被竊恐懼感，此與非疫情期間Wilcox Rountree 及Land(1996)結果一致，即使疫情期間增加住家及其環境人的監控，但因被竊經驗烙印心中，恐懼感仍餘悸猶存；然與Chung 等人(2014)發現當被竊時被害者在家將不會經歷恐懼感不同。第二、集體效能提高顯著增加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此與非疫情期間國內研究陳淑娟和董旭英(2006)發現集體效能愈高的地區犯罪被害恐懼感愈高一致，然與Ferguson 和 Mindel(2007)、Zhao 等人(2015)發現當社區居民能相互信任團結，集體效能體現的結果犯罪被害恐懼感會降低不一致，可

能是疫情封城下，鄰里社區網絡的跨領域連結集體效能更被需要與重視下知覺的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愈益增加，亦如 Yuan(2017)發現，知覺集體效能對住宅竊盜犯罪被害恐懼感在鄰里層級有正向影響。另從結構方程模型圖(圖 3)及路徑分析結果(表 6)發現疫情期間領域感增強能降低被竊恐懼感，人們在鄰里彼此認定所有權歸屬的半開放空間從事各樣活動自能降低被竊恐懼感，本研究且發現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緩和後也強化了領域感，此乃一般迴歸模型路徑分析無法爬梳得到的關係，為本研究結果之獨特性與貢獻性。

二、政策意涵

2020-2023 年 Covid-19 籠罩全球，空城則是防疫下的政策，這寧靜也訴說了人與人連結的需求，缺席則讓通常沒有注意到的看得見了(Warr & Stafford, 1983)。2024 年國內疫情雖降但仍屬流行期，締造了不同於以往的時空背景，觸動著本研究正視過往被忽略的都市半開放空間，從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可能影響因子及路徑分析，思考如何避免居民承受居住安全恐懼，並從 Newman(1972)、Altman(1975)及 Warwick 和 Lees(2022)領域感安全感及都市新樣貌等環境犯罪學視角，提供犯罪防治政策與實務之作為。

自 2019 年末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迫使全球採行人員流動抑制政策，包括：國內及國際旅遊的限制、居家防疫及社交距離管制下，引發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住安全的重要性，而從本研究結果帶出之政策建議：第一、居家辦公期間較非居家期間侵入竊盜減少，然發生在住宅區的比率較商業區增加，此與犯罪學日常活動理論、機會理論及緊張理論相吻合，因此警政機關仍應以犯罪學理論作為預防犯罪之基礎，在居家生活環境中透過集體效能、建築設計等進行改善。第二、傳聞失序與住家及其環境被竊顯著正相關，因此建議警民合力清除社區腐敗(decayed)並加以整頓可以降低犯罪被害恐懼感並增進鄰里凝聚力(neighborhood cohesion)，落實以鄰里為基礎的社區警政有效降低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第三、有較強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將會減少偏差行為、被害及恐懼感。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間居民在傳聞失序時未必以增加保全監視(standard γ = -0.197^{**})來增加集體效能(standard- β = 0.172^{**})或領域感(standard- β = 0.340^{**})，因保全監視某種程度係增加了被竊恐懼感(standard- β = 0.035)，也唯有在住家環境半開放空間居民可以輕鬆釋放被壓抑的緊張。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架構中影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的因素中領域感解釋 27.3%最多，且僅有領域感能降低被竊恐懼感，使住家及其環境被竊恐懼感降低時也增強了領域感，因此居民應透過社區公寓大廈管理強化住家環境領域感，建管單位應

本權責落實建築管理強化居住安全，才能確保都市計畫法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 34 條所訂「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寧靜、安全及衛生。」第四、即使有人在家可取代保全監視功能，住家及其環境被竊經驗仍會直接並透過集體效能、保全監視及領域感深化被竊恐懼感，為降低該恐懼感提升居住安全品質，Chung 等人(2014)指出問題導向(problem-focused)而非情緒中心(emotion-focused)的因應策略(coping strategies)可以緩解(buffer)住家被竊所帶來精神合併症(psychiatric comorbid symptoms)的影響，因此實務上可採 Newman(1972)的理念讓物理環境特質(physical features)能在公共及私人空間提供較好的監視及紋理，住家外空間分割後由小群體控制並在鄰近周圍環境被良好地使用。正如 Covid-19 疫情期間居家隔離，人們相對接近自然與戶外空間的需求大幅提升，住家「陽台」將室內空間退居並引到住宅內的空間形式，不僅活化住宅空間，也在領域感上型塑氛圍，提升生活品質，實為住宅法 39-43 條所倡提升住宅安全品質的具體開展。

Forster 等人(1909)所提孤立城市的崩解，似乎在 2022 年末中國的白紙運動證實了，本研究也從 Young(2021)以及 Warwick 和 Lees(2022)看到後疫情時代的都市新樣貌，尤其在半開放空間安全防衛的脆弱區，將是一個混合多樣性生活機能擁有空間領域感的場域，而超越了 Oscar Newman(1972)防衛空間理論(defense space theory)，能在高密度都市緊密連結中發揮開放空間社交、治療潛能（如：脫掉口罩呼吸較好的空氣品質、較多從事體適能活動等），好讓都市保有韌性及城市永續，力謀增進都市居民的福祉。住家附近半開放空間、曾被荒廢的空地此時變得有價值，公共空間及未被防禦的空間可以被重新定義，因為在允許社交距離下，人們會想逃離住家，轉向附近半開放及開放空間活動，享受空氣陽光的自然療癒、與人寒暄，因此半開放空間的居住安全與公共環境健康更甚於防衛空間的監控，乃是居民彼此對空間使用的協調與默契，在共有空間保有各自的領域感。研究結果建議都市計畫住宅朝 Warwick 和 Lees(2022)倡導都市新風貌，體認到住家的領域被改變了，多以社交舉止(social ritual)如：向侵入陌生人點頭示意等，填補不清楚的物理領域感，半私人、半公共及公共空間可以被開創在密集的都市環境中重塑人文社會關懷，藉由集體效能營造居住安全合宜舒適的居家環境，不讓高大的建築、滿布的鐵窗及大量的保全，建構出醜怪的形象、逃生的障礙以及持續擴大的居住安全問題（游士嫻，2021），乃是從一處喜愛、依戀、安適的家，向外延伸到周邊的街坊鄰里，所屬的生活圈及區域，再到城市的認同感，更有意識地找回生活空間領域感，提升本土犯罪防治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推動之視野。

參考文獻

- 伍大開、黃勢璋 (2023)。Covid—19 三級警戒與犯罪發生。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54 (1)，37-77。
- 洪千涵、許春金、陳玉書 (2014)。犯罪被害恐懼感之調查研究：人口社會解組因素與警政作為之影響。犯罪防治學報，20，69-99。
- 翁國峰 (2007)。集體效能對社區居民犯罪恐懼影響之研究。犯罪學期刊，10 (2)，115-143。
- 陳淑雲 (2012)。經由環境設計促進犯罪預防。鄧煌發 (編)，犯罪預防理論與實務。臺北市：洪葉文化。
- 陳玉書、邱炫綿 (2006)。犯罪被害恐懼感影響因素之分析。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7，161-198。
- 陳淑娟、董旭英 (2006)。個人犯罪被害恐懼感影響因素之研究。犯罪學期刊，9 (2)，31-52。 <https://doi.org/10.29607/ZHWHGX.200612.0002>
- 黃富源、張平吾 (2012)。被害者學新論 (三版)。臺北市：三民書局。
- 游士嫻 (2021)。都市居民住家環境犯罪被害恐懼感影響因子之研究。警學叢刊，52 (2)，69-97。
- 楊雅琳、賴擁連 (2020)。大臺北地區民眾對於住宅竊盜恐懼感之成因探究。犯罪學期刊，21 (2)，1-24。
- 鄧煌發、李修安 (2015)。犯罪預防 (二版)。臺北市：一品文化出版社。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24 年 8 月 6 日)。國內 COVID-19 疫情下降，惟目前仍處流行期，建議民眾儘早接種新冠 XBB 疫苗，降低重症發生風險。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lqS2E5l4YpJYl3FGH-61dA?typeid=9>
- Agnew, R.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1), 47–88. <https://doi.org/10.1111/j.1745-9125.1992.tb01093.x>
- Altman, I. (1975). *Environment and social behavior: Privacy, personal space, territory and crowding*. Monterey, CA: Brooks/Cole.
<https://doi.org/10.2307/2065073>
- Ashby, M. P. J. (2020). Initial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me Science*, 9, 6.

<https://doi.org/10.1186/s40163-020-00117-6>.

- Avery, E. E., Hermesen, J. M., & Towne, K. (2020). Crime victimization distress, neighbourhood social cohesion and perceived police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0(6), 581–592. <https://doi.org/10.1002/casp.2462>
- Basdeo, M. (2020). Creating a program for victims of burglary in Trinidad and Tobag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rtford]. Author
- Batty, M. (2020).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at will the post-pandemic city look lik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47(4), 547-552. <https://doi.org/10.1177/2399808320926912>
- Bottoms, A. E. (1994).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In Mike Maguire, Rod Morgan, and Robert Reiner(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pp. 585-656.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 Brantingham, P., & Brantingham, P. (1995). Criminality of place: Crime generators and crime attractors.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3, 5-26.
- Brown, B. B. & Altman, I. (1981). Territoriality and residential crime: A conceptualframework. In P. S. Brantingham and P. L. Brantingham (eds), *Urban crime and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pp. 55-76). Beverly Hills: Sage.
- Brown, B. B., & Harris, P. B. (1989). Residential burglary victimization: Reactions to the invasion of a primary territo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9(2), 119-132.
- Brumfield, A., & Cubillos, C. (2020). Cities and the public health: Our new challenge in urban planning. *Gensler. RetrievIed July, 21, 2020*.
- Camacho Doyle, M., Gerell, M., & Andershed, H. (2022). Perceived unsafety and fear of crime: The role of violent and property crime,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prior perceived unsafety and fear of crime. *Deviant behavior*, 43(11), 1347-1365.
- Campedelli, G. M., Aziani, A., & Favarin, S. (2021). Exploring the immediate effects of COVID-19 containment policies on cri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hort-term aftermath in Los Angeles.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6(5), 704-727.
- Chung, M. C., Stedmon, J., Hall, R., Marks, Z., Thornhill, K., & Mehrshahi, R. (2014).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following burglary: The role of coping and personality. *Traumat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 65. <https://doi.org/10.1037/h0099374>

- Clarke, R. V. G., & Felson, M. (Eds.). (1993). Routine activity and rational choice (Vol. 5).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Clarke, R. V. C. and Hope, T. (1984) (eds), *Coping with burglary*. Boston: Kluwer-Nijhoff.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9-5652-0>
- Cloward, R., & Ohlin, L. (1960).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A Theory of Delinquent Gangs. New York, NY: FreePress.
- Cohen, L. E., & Felson, M. (1979).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588–608.
- Cullen, F. T., Agnew, R., & Wilcox, P. (2018). *Criminological Theory: Past to Present*. New York: Oxford.
- Cullen, F. T. (1983). *Rethinking crime and deviance theory: The emergence of a structuring tradition*. Totowa, NJ: Rowman & Allanheld.
- Csikszentmihalyi, M., & Rochberg-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Symb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7611.005>
- Dull, R. T. & Wint, Arthur V. N. (1997).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fear of crime and justice attitud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5), 748-75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97012005009>
- Fattah, E. A. (2020). A social Scientist's look at a global crisis: Reflections on the likely positive impact of the Corona virus. *Special Paper: School of Criminology,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Burnaby, BC, Canada*.
- Felson, M. (1995). Those who discourage crime. *Crime and place*, 4(3), 53-66.
- Felson, M., Jiang, S., & Xu, Y. (2020). Routine activity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burglary in Detroit, March, 2020. *Crime Science*, 9(10), 1-7. <https://doi.org/10.1186/s40163-020-00120-x>
- Ferguson, K. M., & Mindel, C. H. (2007). Modeling fear of crime in Dallas neighborhoods: A test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Crime and Delinquency*, 53, 322-349.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05285039>
- Ferraro, K. F. (1995). *Fear of crime: Interpreting victimization risk*. Albany, NY : SUNY Press.

- Fleissner, D., & Heinzelmann, F. (1996).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community policing*.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NCJ 157308.
- Forster, E. M. (1909). The Machine Stops. In *The Eternal Moment*.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14183.003.0006>
- Foster, S., Giles-Corti, B., & Knuiman, M. (2010). Neighbourhood design and fear of crime: A social-ec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rrelates of residents' fear in new sub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s. *Health & place*, 16(6), 1156-1165.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0.07.007>
- Frimpong, L. K., Oteng-Ababio, M., Owusu, G., & Wrigley-Asante, C. (2018).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fear of crime in urban neighbourhoods in Ghana. *Safer Communities*, 17(3), 167-181.
- Garofalo, J. (1979). Victimization and the fear of crim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16(1), 80-97.
- Gerell, M., Kardell, J., & Kindgren, J. (2020). Minor covid-19 association with crime in Sweden. *Crime science*, 9(1), 19.
- Gibson, C. L., Zhao, J., Lovrich, N. P., & Gaffney, M. J. (2002). Social integration, individual perception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fear of crime in three cities. *Justice quarterly*, 19(3), 537-564.
- Google. (2020). COVID-19 community mobility reports. Ireland.
- Hale, C. (1996). Fear of crim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ization*, 4(2), 79-150. <https://doi.org/10.1177/026975809600400201>
- Halford, E., Dixon, A., Farrell, G., Malleon, N., & Tilley, N. (2020). Crime and coronavirus: Social distancing, lockdown, and the mobility elasticity of crime. *Crime science*, 9, 1-12.
- Von Hentig, H. (1948). *The criminal & his victim: Studies in the sociobiology of cri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C. A., & Kinner, S. A. (1998). Correlates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armed robber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aumatic Stress Studies*, 11(4), 787-798.

- Hinkle, J. C., & Weisburd, D. (2008). The irony of broken windows policing: A micro-plac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order, focused police crackdowns and fear of crime.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6(6), 503-512.–
- Jacobs,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21(1), 13-25.
- Jacobs, J. (1962).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4), 907-909. <https://doi.org/10.1525/aa.1962.64.4.02a00530>
- Janoff-Bulman, R. (1992).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New York, NY: The Free Press.
<https://doi.org/10.1080/00029157.1994.10403078>
- Jeffery, C. R. (1971).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4(4), 598-598.
- Kaukinen, C. (2020). When stay-at-home orders leave victims unsafe at home: Exploring the risk and consequ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5(4), 668-679.
<https://doi.org/10.1007/s12103-020-09533-5>
- Kilian, R., Müller-Stierlin, A., Lamp, N., von Gottberg, C., & Becker, T. (2021). Criminal victimization,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in an urban region in Germany: A path analysis.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56(9), 1565– 1574. <https://doi.org/10.1007/s00127-020-02021-5>
- Kunst, M., & Hoek, D. (2024).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domestic burglary victim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ossible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5(1), 430-447.
- Lab, S. (2013). *Crime prevention: evalua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New Providence., NJ: Lexis Nexis Group.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21927-10>
- Lai, Y. L., Zhao, J. S., & Longmire, D. R. (2012). Specific crime-fear linkage: the effect of actual burglary incidents reported to the police on residents' fear of burglary. *Journal of Crime and Justice*, 35(1), 13-34. <https://doi.org/10.1080/0735648X.2011.631408>
- Lai, Y. L., Ren, L., & Greenleaf, R. (2017). Residence-based fear of crime: A routine activitie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1(9), 1011-1037.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56250>
- Lorenc, T., Petticrew, M., Whitehead, M., Neary, D., Clayton, S., Wright, K., & Renton,

- A. (2013). Environmental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fear of crime: systematic review of effectiveness. *Systematic reviews*, 2, 1-10.
<https://doi.org/10.1186/2046-4053-2-30>.
- Miethe, T. D., & Meier, R. F. (1990). Criminal opportunity and victimization rates: A structuralchoice theory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 Delinquency*, 27, 243-266.
- Mohammadi, F., Oshvandi, K., Shamsaei, F., Cheraghi, F., Khodaveisi, M., & Bijani, M. (2021). The mental health crises of the families of COVID-19 victims: a qualitative study. *BMC family practice*, 22(1), 1-7. <https://doi.org/10.1186/s12875-021-01442-8>
- Murdoch, A. & Byczynski, C. (2021).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Sars-Cov-2) Lockdown on Crime in New York and London, March-June 2020 :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9(2),124-155.
<https://doi.org/10.37391/IJBMR.090204>
- Newman, O. (1972).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37(1), 21-40. New York: Macmillan Reciprocal Effects.
- Newman, O. (1973). *Defensible space: 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urban design*. New York: Collier.
- Newman, O. (1980). *Factors influencing crime and instability in urban housing developments: executive summary*.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 Olson, J. A. (1994). Janoff-Bulman, Ronnie (1992). 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 New York: Free Press, pp. 256, \$24.95.
- Ornell, F., Schuch, J. B., Sordi, A. O., & Kessler, F. H. P. (2020). “Pandemic fear” and COVID-19: mental health burden and strategies. *Brazil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2, 232-235. <https://doi.org/10.1590/1516-4446-2020-0008>
- Painter, K. (1996). The influence of street lighting improvements on crime, fear and pedestrian street use, after dark.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5(2-3), 193-201.
[https://doi.org/10.1016/0169-2046\(96\)00311-8](https://doi.org/10.1016/0169-2046(96)00311-8)
- Payne, J., & Morgan, A. (2020). Property Cri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comparison of recorded offence rates and dynamic forecasts (ARIMA) for March 2020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 Pietrawska, B., Aurand, S. K., & Palmer, W. (2020). Covid-19 and crime: CAP's perspective on crime and loss in the age of Covid-19: Crime in Los Angeles and Chicago during Covid-19. *CAP Index*, 19(3).
- Ramey, D. M., & Harrington, N. (2019). Early exposure to neighborhood crime and chil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Health & Place*, 57, 228–237. <https://doi.org/10.1016/j.healthplace.2019.04.010>
- Renauer, B. C. (2007). Reducing fear of crime: Citizen, police, or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Police Quarterly*, 10, 41-62. <https://doi.org/10.1177/1098611106286894>
- Rosenbaum, D. (1987). The theory and research behind Neighborhood Watch: Is it a sound fear and crime reduction strategy?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1), 103-134.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87033001007>
- Rountree, P. W. (1998).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rime-fear linkag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5(3), 341-372.
- Rountree, P. W., & Land, K. C. (1996). Burglary victimization, perceptions of crime risk, and routine activit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Seattle neighborhoods and census trac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2), 147-180.–
- Sampson, R. J., Raudenbush, S. W., & Earls, F.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5328), 918-924.
- Scarborough, B.K., Like-Haislip, T.Z., Novak, K.J., Lucas, W. L., & Alarid, L.F. (2010).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fear of crime.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8(4), 819-826. <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0.05.010>
- Short, E., & Ditton, J. (1998). Seen and now heard: Talking to the targets of open street CCTV.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8(3), 404-428. <https://doi.org/10.1093/oxfordjournals.bjc.a014255>
- Skogan, W. G., & Maxfield, M. G. (1981). *Coping with crime: Individual and neighborhood reactions* (Vol. 124, pp. 74-77).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kogan, W. G. (1987). The impact of victimization on fear.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1), 135-154.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87033001008>

- Skogan, W. G., & Maxfield, M. G. (1981). *Coping with crime: Individual and neighborhood reactions* (Vol. 124, pp. 74-77).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mith, L.N., & Hill, G. D. (1991). Victimization and fear of crim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18(2), 217-39. <https://doi.org/10.1177/0093854891018002009>
- Stickle, B., & Felson, M. (2020). Crime rates in a pandemic: The largest criminological experiment in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5(4), 525-536.
- Swatt, M.L., Varano, S.P. Uchida, C.D., & Solomon, S. E. (2013). Fear of crime, incivilitie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four Miami neighborhood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1, 1-11. <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2.09.004>
- Taylor, R. B. (1987). Toward a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of disorder: delinquency, crime, and fear of crime. In D. Stokols & I. Altman (eds.),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Vol 1)(pp. 951-986). New York: Wiley.
- Warwick, E., & Lees, L. (2022). Osmosis across defensible space: Observations and lessons from dérives in London during COVID-19. *Urban Geography*, 43(6), 810-820.
- Warr, M. (2000). Fear of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Avenues for research and policy. In D. Duffee(Ed.)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crime and justice* (Vol. 4, pp.452-489).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Justice.
- Warr, M., & Stafford, M. (1983). Fear of victimization: A look at the proximate causes. *Social forces*, 61(4), 1033-1043. <https://doi.org/10.1093/sf/61.4.1033>
- Washington Post-ABC News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context-cdn.washingtonpost.com/notes/prod/default/documents/5ff24ba7-0686-4393-b2fe-86c39447bc9d/note/943d692c-f812-4ec3-a0a7-cabd64d36d4b.#page=1>
- Rountree, P. W. (1998).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rime-fear linkag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5(3), 341-372.
- Rountree, P. W., & Land, K. C. (1996). Burglary victimization, perceptions of crime risk, and routine activitie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Seattle neighborhoods and census trac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3(2), 147-180.
- Wood, E. (1961). *Housing design: A social theory. Ekistics*, 12(74), 383-392.
- Yasin, A. S. (2020). Prevalence, intensity and manifestation of COVID-19 fear: A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 *Psychiatria danubina*, 32(3-4), 499-504. <https://doi.org/10.24869/psyd.2020.499>

- Yim, H. N., & Riddell, J. R. (2024).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commercial burglary during the COVID-19 lockdown in San Francisco.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20(1), 187-205.
- Young, A. (2021). The limits of the city: Atmospheres of lockdow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61(4), 985-1004. <https://doi.org/10.1093/bjc/azab001>
- Yuan, Y., & McNeeley, S. (2017). Social ties, collective efficacy, and crime-specific fear in Seattle neighborhoods. *Victims & offenders*, 12(1), 90-112.
- Zhao, J. S., Lawton, B., & Longmire, D. (2015). An examination of the micro-level crime-fear of crime link. *Crime & Delinquency*, 61(1), 19-44.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10386203>

\